

新名词与辛亥革命时期之中国

——以来自日本的影响为中心

沈 国 威*

一、西学从东方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是中国由封建王朝的“天下”逐步走向民主共和的“国民国家”的转型期。除了国家体制外，思想、文化等领域也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过渡，故当时的人们称之为“过渡时期”。这种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蜕变的实现，是以近代新知识的获取为先决条件的，而世纪之交的日本对于中国来说正是不可替代的新知识的提供者。然而，如日本历史学家渡边三男所指出：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从日本获取知识的愿望¹⁾。日本不但是情报收集的对象，同时也可以成为新知识的提供者，这一意识是在甲午战争（1894~1895）战败之后才逐渐萌生出来的²⁾。1896年秋，《时务报》创刊。主编汪康年在同梁启超商谈该杂志的宗旨时指出：“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开民智而雪国耻³⁾。”为此，汪康年计划开设一个专门登载来自日本媒体的新闻报道的专栏——《东文报译》，并委托清政府驻东京大使馆的查双绥帮助斡旋日文翻译人员。查双绥在给汪康年的回信中说：“日本新出政治书甚夥，容略暇当详为探问，并史书各种价目，一齐开单奉览⁴⁾。”从查双绥回信的内容中可以推测，汪康年也曾请求查氏就日本书籍的整体情况进行调查。《时务报》自第3号（1896.8.29）起，以日本的报纸杂志为消息来源的《东文报译》专栏正式登场，负责从日本媒体中挑选报道内容并将其译成中文的是日本的汉学家古城贞吉⁵⁾。与此同时，康有为也在积极地试图从日本的书籍中汲取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新知识⁶⁾。康有为1897年正月初十起，从广西桂林数次致

*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关西大学 ICIS 事业推进担当者

- 1) 参照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笠間書院，2008年改订新版第81页。
- 2) 例如，所谓第一批清政府公费留学生，实际上是为了培养译员而派到日本大使馆去的年轻人。由于某种原因，这批人被委托给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这种计划外的安排，使中国的青年们作为“第一批留学生”接触到了日本的近代教育的内容。可以不容置疑地指出，1896年3月当时，总理衙门尚无向日本学习的意识。
- 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2页。
- 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1277页。
- 5) 沈国威《〈時務報〉の東文報訳と古城貞吉》，《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四号，2009年45-71页。
- 6)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74页。

信其弟子梁启超，商讨在广西设立学校、翻译日文书籍、出版报纸、修筑道路等的可能性。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于1897年5月在《时务报》上的〈译书〉一文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钜”⁷⁾。这是中国士子第一次公开主张通过日本学习近代的新知识。《时务报》第42号(1897.10.16)又刊载了梁启超的〈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该文对设立译书局的宗旨作了如下阐述：“联合同志，创为此局。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的翻译方针说明梁启超等已经把引介新知识的重心从西方转向了东方，而“邦人新著之书”云云则表明只要是新知识，不管是经由日本，还是原本出自日本的都被梁康等纳入了视野之中。进入20世纪以后，清政府意欲通过包括实现君主立宪制在内的政治改革——即所谓的清末新政，渡过危局。在这种背景下，同为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不论是对改革派来说，还是对清政府来说，都毫无悬念地成了中国效仿的范本，“师法日本”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如美国历史学家任达所指出：日中关系迎来了黄金十年⁸⁾。笔者曾指出“西学自东方来”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作为现代知识传播途径之一的“日本途径”业已确立⁹⁾。

新知识既然经由或来自日本，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的影响。在当时，这种影响不仅仅涉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也包括信息的载体语言，即汉语。新词的激增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文化事件。为迎接新时代而进行的思想准备、民众动员以及新概念的接受等，均在语言层面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有人说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近代史的话题无法规避日本，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如若没有来自日本的新词、译词，我们甚至无法表述近代中国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和现象。关于近代历史、思想史及社会史等研究方面中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纠葛，将由各领域的专家们去探讨，作为语言研究者，笔者于本文的课题是：考察中国社会对于那些给社会思想带来巨大冲击的日语词汇是如何接受的，以及在接受过程中中国社会做出了何种反应。

二、新知识的接受与新名词*

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国语词典——《辞源》的总编陆尔奎在辞典卷首的《辞源说略》中写道：“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迭盈幅。”王国维也于1905年时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¹⁰⁾。”而创办《时务报》的汪康年则在晚些时候对这段历史回顾道：“近年广译日本书籍，遇有日人所用名词，

7) 《时务报》第27号(5月27日)、29号(6月10号)、33号(7月20日)。

8) D. R. 任达，《新改革革命与日本》，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 沈国威〈中国における近代知の受容と日本〉、沈国威編著《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関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1-41頁。

10) 王国维〈论新语学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号，1905年4月。

* 本节主要根据沈国威《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2月，285-320頁)改写。

即一律承用，而新名词流入文字者，指不胜屈。甚至公牍用之，甚至诏旨亦用之。而稍涉新学者，尤满口皆是¹¹⁾。”从这些言论可知，新名词作为社会问题显现出来是1903年、1904年前后的事情。而且所有谈论这个话题的人都认为，所谓的新名词几乎都是借自日语的学术用语。任何时代都有新旧词语交替的问题，但像20世纪初叶的中国那样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骤然且大范围地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知识引介的紧迫性。西方书籍的翻译工作，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官办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北京同文馆等处开始了。但是翻译内容仅限于技术制造（同文馆有部分法律书籍），有关政治、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翻译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针对选拔年轻人学习西方语言，然后翻译西文书籍的主张，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自序中指出“吾国岌岌。安得此从容岁月。”梁启超也在《大同书译局序例》中说：“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西洋书籍的翻译所面临的是既无人才又无时间的窘况，通过日文书转译西文书，以达到迅速接受西方新知识之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权宜之计。

第二，教育制度（人才录用制度）的改革。1898年4月，光绪帝下诏废八股、课策论。湘、赣等省反应迅速，随即在考题中加入了有关时事和新知识的内容。同年10月，发生了戊戌政变，改革派推出的诸项政策均被废止，惟科举改革得以继续进行。1903年癸卯恩科虽未能完全废止八股文，但追加了策论。新名词也就成了获取功名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一部分欲使用那些不知所云的新名词以迎合考官的考生来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成了最好的参考书。一些改革派官僚如吴士鉴、江标、徐仁铸、张鹤龄等也以新名词的拥护者而为人所知，由他们主持的科举考试也更加重视策论的成绩。江西学政吴士鉴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¹²⁾。吴士鉴在1901年的江西岁试时十分欣赏考生熊元镠答卷，批语说他的文章“能摹梁文”，即颇具梁启超的文风。吴士鉴因此将熊元镠列为头名。青年熊元镠自1900年起开始与严复通信成为严复的得意门生，新学知识丰富¹³⁾。江西岁试时的策论题目虽无从知晓，但第二年乡试所课的策论题之一是“西国学术，有形无形下之分，其已成科学者，凡几，要旨若何，何者最为切用，宜审其先后缓急之序，以资采择而收实效策¹⁴⁾。”熊元镠“条列旧闻以对，蔚为举首”，得中举人。

第三，学习日语、留学日本、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898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鼓吹翻译日本书的必要性，甚至主张无需翻译直接阅读日文书籍亦有可能¹⁵⁾。随着张之洞的《劝学篇》（1898秋）被广泛传阅，赴日留学、学习日语以及翻译日文书等都出现了热潮。日语中的表示

11) 汪康年，1911年4月26日《刍言报》。

12) 吴士鉴，1868-1933，浙江杭州人，1892年（壬辰）进士。历任江西学政、湖南提学使等。曾为视察教育而访日。

13) 王栻主编《严复集》二，273-275页。

14) 《江西乡试录》、《江西乡试闹墨》，熊元镠等撰，奎宿堂刊。熊元镠在此提出的问题正是教育制度改革中被广泛议论的问题。

15) 沈国威〈日本発近代知への接近——梁啓超の場合〉，《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2010年，217-228页。

实质性概念的词语基本上都是汉字词，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许多日语词汇未经充分的翻译处理就被直接引进了汉语的文章。

第四，接受新知识的阶层非常广泛。学习日语或赴日留学的人不仅有想改变中国的热血青年，还有很多失去了科举致仕门路的旧士大夫。其中有许多人在结束了短期留学回国之后，担任政府要职，很大一部分政经类新名词就是通过他们的文章等得以广泛传播的。

第五，媒体的作用。正如陆尔奎所指出的，20世纪初，报纸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中充满了中国典籍中所看不到的新词、译词。报学史研究者戈公振指出：“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文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介绍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¹⁶⁾。柴萼也曾在《新名词》一文中指出：改革派的报纸杂志如《时务报》、《湘报》、《湘学报》以及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创刊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在新名词的普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¹⁷⁾。西方的传教士们也敏感地注意到了报纸在新名词普及方面的作用。狄考文的遗孀在其所著的 *New terms for the New Ideas, 1913* 中收录了大量的当时报刊上使用的新词¹⁸⁾。柴萼指出：“迨宣统纪元。颁行先朝宪典。则四万万。见于上谕。闻秉笔者即东海徐世昌也”。“四万万”这一说法如后文所述，曾被王先谦等人大加鞭笞。然而实际上，不用拉出清王朝行将灭亡前的宣统，连以光绪、慈禧的名义颁布的上谕中也不乏新名词，如：宪法、议院、议员、民主、共和、自治等。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报刊争相全文登载上谕，所以上谕中所使用的词语的影响也就不仅仅限于公职人员了。

短时期内新名词激增这一现象，也给语言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辞源》的主编陆尔奎说：“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物。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捍格，文化弗进。”柴萼也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盖新学者不能读古书。而老生又不解西籍。二者交讥。”也就是说，新名词使得新旧知识产生了隔绝，明显地损害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张之洞的门生、以诗文著称的樊增祥在谈到当时的流行语“过渡”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新学家皆曰今日是过渡时代。夫所谓过渡者，由此岸达彼岸方及中流之时也。全国之人方半济于风涛之中，半立于崩沙之上，而欲学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正坐危言¹⁹⁾”虽然半是调侃的语气，但也暗示人们，新名词仅仅从字面解释未必能得到其正确的意思。特别是一部分中国典籍中的词语在日语中作为译词被赋予新意时，新旧词义发生冲突，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例如：“经济”、“革命”、“自由”等就非常不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作为学术用语的新名词反倒成了新知识的引介与传播的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编撰新的术语词典和新国语词典。《新尔雅》(1903)和《新释名》(1904)可以说就是最初的尝试。《新尔雅》是由日本的大学讲义录或入门书翻译而来的，其编者汪荣宝、叶澜后来参与了宪法起草及新法律

1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131页。

17) 柴萼《新名词》，《梵天庐丛录》，中华书局，1926年，卷27，33叶。

18) 沈国威《西洋人记录的世纪之交的新汉语》，《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2辑，2009年，101-111页。

19) 樊樊山《樊山判牍正编续编》，樊楚才编，大达图书供应社，1933年。《樊山政书》，中华书局，2007年。

制定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²⁰⁾。《新释名》由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9号上开始连载，原本打算连载之后出版单行本，但只连载了三期就告终止了。这两种书都用中国最古的字书《尔雅》《释名》为书名，采用大词条的形式，选择重要的术语名词，加以百科全书式的说明。同时，还有不少日本的术语词典被直接译成中文出版²¹⁾。1915年出版的中国的国语辞典《辞源》也大量地收录了来自于日语的语词²²⁾。

三、毁誉参半的新名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渠道，新名词给中国传统的语言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1905年，王国维指出对于骤然出现的日本新词、译词，中国的语言社会存在着两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围绕着新名词出现的种种反对意见，其中既有纯粹语言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语言学乃至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前者如严复，从译词词义准确性的观点，对“经济学”、“自由”、“宪法”等词提出了质疑。王国维也指出来自日语的“直观”“观念”未必是好的译词。同一母语的译者在译词创造、选择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由非母语使用者的日本人创造的汉字词，引发了合适与否问题实属极其自然之事。

然而，更多的反对意见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柴萼在上述文章中这样写道：以前严复翻译西方书籍时，尽量模仿古代的文章。“图腾”、“宗法”、“拓都”、“么匿”等译词都极雅驯，能够令人想起周、秦的古文。在同一时期，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活跃在上海。最初梁撰写《变法通义》时，对文章还十分重视，到了后来，毫无顾忌地使用起了“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等词语。继而，《湘报》创刊，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在上面发表文章，与之呼应。面对此一状况，旧文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恐慌²³⁾。

守旧文人的代表级人物王先谦，于1898年夏致信时任湖北巡抚的陈宝箴攻击新名词，王先谦在信中说：自《时务报》创刊以来，文章大乱。脑筋、起点、压力、爱力、热力、涨力、抵力、阻力、支那、黄种、四万万等词语泛滥于文章，污秽了文坛。文体的混乱必然动摇中学的根基，于公于私均有害无利，应当废止这些刊物²⁴⁾。

20) 沈国威编著《〈新尔雅〉とその語彙》，白帝社，1995年。

* 本节主要根据沈国威〈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对“新名词”之反应〉，《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2号，2007年3月，105-124頁）改写。

21) 沈国威〈中国近代的科技术语词典（1858-1949）〉，《或问》，第13号，137-156页。

22) 沈国威〈《辞源》与现代汉语的新词〉，《或问》，第12号，2006年，35-58页。

23) 柴萼《梵天庐丛录》，中华书局，1926年，卷27，33叶下-35叶上。原文为“向者侯官严复译书。务为高古。图腾、宗法、拓都、么匿。其词雅驯。几如读周、秦古书。新会梁启超主上海时务报。著变法通义。初尚有意为文。其后遂昌言以太、脑筋、中心、起点。湘报继起。浏阳唐才常、谭嗣同和之。古文家相顾惶恐。”

24) 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1805-1806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2年，579-602页。

同为湖北缙绅的叶德辉也写文章抨击新名词说：自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新知报》以来，异端语句、西洋俗语如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泛滥，东南各省之文章倾向诡僻，已经不能称其为文章了²⁵⁾。

二人所举之例十分相似，均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但是，这些词语中的多数并非什么新词。如下表所示，早在那之前的传教士的译著及杂志中就已经被大量使用了。

新名词一览表

	《格致汇编》 1876~1892	《中西见闻录》 1872~1875	《时务报》 1896~1898
以太	0	0	0
脑筋	9	13	5
起点	1	0	11
压力	224	62	19
爱力	31	0	22
热力	0	4	2
涨力	70	1	6
抵力	25	10	0
阻力	60	8	13

也就是说，20世纪初西方知识引介的重心由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旧文人们对传统的经世济民一类的文章中出现的的新词更加敏感，新词问题随之凸显。对此，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这样分析道：“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²⁶⁾。”

除了在野的文人外，清政府中的重臣如张之洞、端方等也是新名词的强烈反对者²⁷⁾。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一起制定了《学务纲要》，在〈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典〉一节中²⁸⁾，强调：古文、骈体文、古今体诗辞赋等中国各种文体是世代相承的世界文化之精华，是保护国粹的一件大事。在不妨碍其他学科的条件下，各地方的学校必须予以重视。并要求“凡教员科学讲

25)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翼教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255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2年，602-608页。

26) 王国维前揭论文：〈论新语学之输入〉。

27) 张之洞非常讨厌新名词，当时的报刊上曾登载过张之洞严厉斥责使用新名词的幕僚的逸闻。参照雷颐《从张之洞厌恶日本新词说起》，《光明日报》2002年12月3日，亦参见《盛京时报》（1908年正月廿九日）载《张中堂禁用新名词》。

28)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1903年9月。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书局，1928年，8-30页。

义，学生科学问答，于文辞之间不得涉于鄙俚粗率”。在〈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节中，纲要的作者提出以下警告：近来，年轻人喜欢使用外国的词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这类词语与中国固有的词语相比，“固欠雅驯”，所以今后在“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在此之前，《大公报》在1903年2月21日的要闻版曾刊登了四川学使吴蔚若的训辞。吴蔚若在文章中说：组织、思想、团体、发达、代表、目的、剧烈、压力、涨力、热力、爱力、能力、风潮、膨胀、起点、正比例、反比例等被滥用的词语不胜枚举。吴蔚若批评道：浅学之辈偶尔看了西洋的翻译书籍，对其内容不求甚解，仅仅记住某些词句，用以解释中国的古籍，议论杂乱无章，缺乏一贯性，与以前的八股文如出一辙。吴蔚若还告诫科举的考生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参加科举考试时不要使用古典中不曾出现的词句。

对来自日语的新名词表示极力排斥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日本的语言不够“雅驯”。

《学务纲要》用“文字怪异”、“鄙俚粗率”、“固欠雅驯”等词来严厉批评新名词。樊增祥的“丑怪字眼”、《国粹学报》的“东洋文体粗浅”、刘师培的“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可言。”等评价也都具有同样的意思。“固欠雅驯”成了新名词的致命伤。

当“雅驯”属于词汇层面的问题时，其含义是文章中所用的词汇必须要来自于中国的典籍。使用中国的古典中不存在的词语是破坏“雅驯”的主要原因。《学务纲要》指出：日本的优秀学者在其著作中使用汉文时，都极为雅驯。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所用的词语均来自中国的经史子集，而不采用其他。樊增祥认为，所谓的新名词就是把古今文章中从未组合在一起的字硬捏合起来的東西。“雅驯”如此被重视，是因为文人们认为，“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词语不雅驯，就无法表达高尚的内容。

二、对文章形式的破坏。

文人们认为新、旧词语及中、外词语的混用，破坏了传统文章的文体统一性。《学务纲要》指出：如果任由中外文章的形式混用下去，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文章体裁以及汉字的意思都被改变，中国的学术传统也将丧失殆尽。这段表述给人一种严重的危机感。所谓中国文章的形式，指的就是韵律、对偶等句式上的特征，以双音节词为主的新名词的大量使用，必定会使文章的节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新名词的定义不明确，部分使用者误用滥用新名词。

使用者对新名词的理解不足也是招致反对的重要理由之一。《大公报》于1903年3月1日和4月19日分别发表社论《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和《学魔》，指出：当今的中国有一些人旁若无人地夸耀文明，充其量也就读过那么几本翻译过来的书，知道那么几个来自日本的术语，不过就是记住了几个新名词而已，却误以为自己就是文明引介的主角，其实所掌握都是些无用之物。新名词

的滥用不仅无益于国民的才智进步，也扰乱了国民的前进方向。《申报》于1906年6月30日发表了题为〈论文字之怪现象〉的文章，批评当时的文章在陈腐的表达中混入难懂的新名词的作法。同年10月28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的文章。该文指出：新名词进入中国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在不明其真正意义的情况下，仅凭字面的意思就盲目使用。作者还举“家族革命”、“地方分权”、“抵力压力”、“自由”、“平等”、“共产”、“运动”、“竞争”、“权力”等词为例，批判一些居心不良者甚至以新名词为护身符来败坏民众的道德。

当时的文章在解释术语的意思时，多使用行间夹注，著者们为使新名词得以普及定型花费了不少力气。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就个别词语进行解释，而不系统地介绍新知识就无法完全理解该词的意思。《新尔雅》等百科全书式的术语集之所以受到喜爱，原因就在于此²⁹⁾。

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应。

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认为无法期待经由日本引进完整的西方新知识。也有很多人主张，新名词的很大一部分早已存在于中国的典籍之中，并非日本人所造，只不过是日本人用中国的古典词来充当译词罢了。最早进行从中国典籍中追寻新名词词源的是周商夫，他编纂的《新名词撰撰》（上海扫叶山房，1918年）共对615条词做了词源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王云五出版了《王云五新词典》（商务印书馆，1943年），试图证明3700多条新名词出自中国的典籍。

但是，新名词广泛使用并不是人为可以阻止的。即使是对新名词大加鞭笞的《学务纲要》也无法完全避免来自日语的词语。这篇不足两万字的文章里使用的新名词不计其数，如在〈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一节中，作者们为了厘清被那些“剽窃西学者”断章取义误解滥用的“民权、自由”的意义，整段地引用了日本宪法的第二章。这一节中使用的术语有：民权、义务、权利、自由、法律、公权、私权、立宪君主政体、共和民主政体等。可见涉及宪法和政治体制的内容时，新名词已经成了不可少的表述手段了³⁰⁾。

柴萼上引文章的结尾说：“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这个结论意义颇深。就是说新名词不但输入了新的概念，同时也在语词层面为言文一致的文体革命做了准备。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体的确立，就是以新知识的传播所不可或缺的新名词的普及定型为前提的。柴萼还说：梁启超当上司法长官后，曾打算将“取消”、“手续”和“目的”分别改为“撤销”、“程序”和“鹄的”，但为时已晚，来自日语的术语已经完全定型了。

王国维从语言的角度对新名词不可避免的理由做了分析。王国维将新名词的出现视为时代之趋势，他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处今日而

29) 这些词典主要是从日本的术语辞典翻译过来的。沈国威《《新尔雅》とその語彙》白帝社，1995年。

30) 《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于1901年由沈缙等人译成中文。张之洞的相关知识应当是从沈缙等的翻译中获得的。

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认为从日语中借用新词译词，第一、较之自创更为方便。第二、若日中使用同一术语，则有利于学术交流。

执教于北京大学的服部宇之吉在其《心理学讲义》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奏定学章程纲要有不许用新语之不雅驯者一条。然学术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创作新语，中国不乏其例，……盖传外国之学术宗教者，自己国语苟无适当之语，则不得已而为此也。玄奘等所创作之新语在当时未必皆雅驯，而今人则不复问其雅驯与否。毕竟不过惯与不惯而已。今中国正当广求知识于外国之时，而敢问语之雅驯，或因此致阻碍学术之发达，则岂能免颠倒本末轻重之讥乎。本书所用学语，专据日本学界常用之语其中或有所谓不雅驯者，然在日本则既已通行，而在中国又无可代用，毋宁仍用之，非敢蔑明章也³¹⁾。”

在当时各种批判新名词的文章中反复出现并具有强烈“新词意识”的词，有如下所示的例子³²⁾，这些词基本上都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

以太 脑筋 脑蒂 中心 起点 现象 政事 商业上 手续 目的 规则 场合 但书
 成立 取消 经济 积极 消极 有机 无机 民主 野蛮 思想 组织 团体 国魂 膨胀
 舞台 代表 报告 困难 配当 观念 牺牲 影响 机关 冲突 运动 家族 革命
 抵力 压力 自由 平等 共产 竞争 权利 革命军 地方分权 精神 势力圈 中心点
 方针 欢迎会 预备科 学界 维新 进步 过度 改良 个人 腐败 全体 料理 支那
 大剧场 同胞 直接 间接

四、新名词与国民教育

可以说包括立宪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围绕立宪展开的清末新政的实际内容是君主立宪政体制度的设计及为此而进行的国民创造。二者均以日本为范本，主要的思想资源也来自日本。在宪法制定上清政府如何利用日本资源是近代宪政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成果丰富。本文仅以至今为止尚未被利用的国民必读书一类的资料为素材，特别从新名词的角度来考察清末国民教育中来自日本的影响³³⁾。

朱树人编著的《国民读本》（上海文明书局，1903）是最早冠以“国民”一词的书籍之一。从书名中的“读本”这一日语词就可以知道本书中包含有日本要素。本书以通俗的文言文体写成，但大量使用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尚不能理解的新名词。朱树人之后，高步瀛、陈宝泉编译的《国民必读》（北洋大臣学务处，1905）和孟昭常著的《公民必读》（预备立宪公会，1907）相继公开

31) 服部宇之吉《心理学讲义》，东亚公司，1904年。

32) 不过，在这里成为问题的是所谓的新词意识。清单中所列词语并非全部由日本所制。

33) 沈国威、孙青〈巖復と清末学部編《国民必読家課本所編》(1910)〉，松浦章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情報の発信と受容》，雄松堂，2010，31-54页。

发行。这两本书也多从日本的书籍中汲取内容和观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清学部编撰的《国民必读课本》(1910)。清政府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发表了立宪准备工作的一览表——〈九年预备立宪之清单〉。编撰、出版《简易识字课本》和《国民必读课本》即为其中的一项,目的在于提高民众识字率、培养适合于立宪国家的国民。根据学部上报的编撰方针,《国民必读课本》由甲、乙两编构成。甲编,内容简单,范围较窄,引自四书五经的内容也少。乙编,内容较深,范围较宽,引自经书的内容也较多。甲编乙编又各分上下两卷,上卷从经书中收集以明大义的内容为中心的文章,并用秦汉唐宋的儒家们的学说对其进行论证。下卷则采录清朝历代皇帝的旨谕、制度典章及法令中的重要部分,并效仿《圣谕广训直解》的方式,附加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但是,最终经严复校订后出版的《国民必读课本初稿》却大大偏离了当初的编撰方针。甲编下卷是就国家的体制进行说明的部分,在〈宪政〉一节中,编撰者首先抄录了两道圣谕: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和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颁布的关于预备立宪的上谕。继上谕之后,有模仿《圣谕广训直解》的“直解”形式而写的叫做“谨案”的解释部分,就立宪谕旨、君主立宪、统治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术语加以定义性的说明。

乙编下卷的内容与甲编下卷相同只是论述得更加详细。例如同样是〈宪政〉一节,首先抄录了自1906年至1910年的八道上谕,〈谨案〉在对“宪法”做了定义性的说明之后,就“政体、大权、议院、行政、司法、臣民之权利义务、地方自治”等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与圣谕、广训、直解的关系不同,与其说因为有了“上谕”,所以才有“谨案”,不如说是“谨案”先行,至于“上谕”则不过是为了增加权威性而后加上去的“点缀”,颇像文革期间的“毛主席语录”。从使用的词语上可以知道,“谨案”的内容来自相关的日本图书。

下面再来看一下有关国民的记述。甲编下卷中的〈国民〉一项,由〈国民教育〉、〈国民常识〉和〈立宪国民〉三节构成。〈国民教育〉要求国民:要想获得立宪国民的资格,就必须努力学习,明白忠君爱国的大义,知道社会进化的道理,努力完成国民应尽的义务。作为具体的教育内容,本节提出了“三育”:德育、智育、体育。〈国民常识〉一节中编撰者指出:常识就是人生所必需的普通知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修身、国文、算数、体育;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法律、经济、图画等也是不可缺少的。〈立宪国民〉所讲解的是,与专制政体国家的百姓不同,立宪国民的法律地位受宪法保护,国民可以全面参与国家政治,国家的富强取决于国民的文明程度,所以作为国民必须丢弃依赖心理,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

继甲编下卷之后,乙编下卷在〈宪政·臣民之权利义务〉一节中列出了以下的条目:

-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
- 二、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 三、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 四、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呈诉之案件。
- 五、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
- 六、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八、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九、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

一见便知，这是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附臣民权利义务”的内容。这个大纲由宪政编查馆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对于各项的具体内容，制定者只说“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但在这里编撰者对各条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文中使用了以权利、义务、宪法、选举、议院、议员、言论、出版、集会、思想、公益事业、审判、纳税等来自日本的新名词。

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指出，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素质包括：自尊、合群、尚公德、尚武、进取等，同时梁还就权利思想和义务思想进行了论述³⁴⁾。朱树人、高步瀛、陈宝泉等也分别从国民必备之知识与素质的观点，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尤其是高陈的《国民必读》根据日本国民教育内容，提出了“军国民”问题。但是，像学部的《国民必读课本》这样对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详细说明的图书还没有。学部的《国民必读课本》尽管使用的是“臣民”这一日本宪法条文中的称呼，而非“国民”，但其内容得以实现之际，近代国家的“国民”必将取代专制国家的“臣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对上谕加以解释的“谨案”竟包含了如此崭新的内容！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政权中枢的意图不得而知，严复等所起的作用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负责编写的人员都是留日学生这一点是重要的。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必读课本》采用的是文言文的语言形式³⁵⁾，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矛盾性决定了书中的内容不可能马上渗透到整个社会。尽管如此，在使“宪法、自治、国家、国民、民主、共和、权利、义务”等当时的关键词得以普及定型方面，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正是用这些日本制的新名词在描绘着自己的未来。

五、代结语

具有王朝更替意义的汉语古典词——“革命”，在江户幕府时代末期的日本，词义发生了变化。如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1866-1870）中，“革命”一词的意思变成了“通过暴力手段使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形态及权力分配发生急剧变化”³⁶⁾。法国大革命就是被当作典型的事例介绍给了日本读者的。而《哲学字汇》（1881）给出的解释是：“Revolution 革命、颠覆。按：兴国谓之革命，亡国谓之颠覆。”尽管编纂者试图赋予“革命”以正面的含义，但依然未能抹去“革命”一词所具

34) 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5) 本书无标点，言及清王朝统治者时，改行，行头上提三格。参见沈国威《旧形式与新内容》，《澳门语言文化研究》，澳门理工学院，2011年，197-224页。

36) 自19世纪末开始，又增加了由“急剧变化”之义派生出来的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用例，并扩大至其他领域。

有的暴力形象。特别是“革命党”一词被用于称呼那些想以暴力手段改变现状的人群。孙文极其追随者在中国不断发动的武装起义，被日本媒体报道为“革命党的暴动”，“革命”甚至成了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的流行语³⁷⁾。“革命”和“改良”成为两面旗帜，人们集结于各自不同的词语下，既相互对立，又犬牙交错。以实现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改良派在理论上和民众动员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竭力要避免革命的发生。但是，立宪的努力遭到了清王朝内保守势力的反对，“皇室内阁”的成立浇熄了改良派的希望之火。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于武昌的武装起义，完全不同以往，许多省份以宣布独立的形式与之呼应，清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武昌起义被称为革命也是历史的必然。11月由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公布。宋教仁曾在日本的法政大学研究过各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鄂州约法》用“三权分立、议会、自由”等新名词宣传了民主与共和的理念。

翌年2月，宣统帝发布退位诏书。这份宣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结的诏书中使用了“代表、国会、政体、心理、共和、立宪、国体、选举、组织、领土”等新名词。这份被传为由张謇执笔，经袁世凯审阅的诏书，实际上是出自张謇的幕僚曾经留学日本的举人杨廷栋之手。论者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于普及了民主、共和的思想。新名词目睹了旧时代的终结，见证了新时代的开启。但在当时，用新名词表述的新知识却不得不依赖于文言文这一旧的语言形式。“尚未成功”的革命也必定包括言文一致的内容，因为文体改革不成功，新知识也就无法在全体国民中得以普及。

37) 19世纪末的“革命”带有较浓厚的暴力色彩。孙文因被日本报纸成为“革命党”而就此自称革命党的传闻并未经过证实，但梁启超很早就发现了“革命”一词给人以暴力印象的问题，并建议改用译词“变革”。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